

K291
39
✓

8037/14

北京与周围 城市关系史

王 玲



北京燕山出版社

B 595220

前 言

北京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不仅是全国人民所注意的中心，也为世界所瞩目。北京是一个十分古老的城市。北京历史的研究，从来是人们十分感兴趣的问题。但是，专门研究、探讨北京与周围城市的历史关系，这还是一个新课题。

历史上，记述北京情况的书籍不少，但往往把北京作为一座孤立的都市来对待。即便是《畿辅通志》这样的大型志书，虽然囊括了整个京畿地区的大量内容，但仍然把各个城镇、县邑看作一个个的点，而没有讲清这些城市间的相互关系，特别是讲清与北京的内在联系。当然，更不可能用科学方法探讨其中的发展规律。解放后，北京史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首先是历史地理学者，开始把北京放到一个较大的自然地理环境之中，综合探讨这个城市的发育、成长过程。在这方面，侯仁之先生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在用现代科学方法研究北京历史方面成为一个先行者。与此同时，考古学者和北京史专门研究人员，都在开始打破城池、街坊、宫室、园囿，这一套旧的研究方法，尽量从整个幽燕地区的历史环境中找到北京城市发展的规律与脉络。于是，人们逐渐感到，研究北京周围城市和地区，搞清它们对北京发展所起的重要作用，已是迫在眉睫的事情了。填补这个空白，是北京史研究者一项义不容辞的任务。

城市学研究者有一个重要论断：“现代城市是一个大的开放体系。”它不仅集中了财富、文化和人口，而且不断接受和发射着各

种信息。其实，如果我们研究一下历史，城市的这种特征，不仅在现代才有，古代的城市也是一个联络和领导周围地区的中心，国家的都城更是联络全国的中心。只不过，在不同历史时期，城市的开放程度不同罢了。正因为如此，任何一个城市，尤其是都城，它本来就存在着与周围地区和城市的广泛联系。

从“城”的最初起源来说，或许曾经经历了一个短期的“闭塞时期”。从语言学角度看，“城”是指高墙壁垒，“市”是讲贸易交换的中心。西方城市，经常由贸易交换中心发展而兴起。但就中国最初的城市而言，首先是为防御的需要而出现的，有一个有城无市的阶段。《抱朴子·诘鲍篇》说：

“曩古之世，无君无臣……势力不萌，祸乱不作，干戈不用，城池不设。”

可见，在没有战争，没有阶级的原始时代，城市是不会产生的。在什么情况下城市才出现？《礼记·礼运篇》说：

“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

这就是说，当有了家庭、私有制，有了阶级，由于“货力为己”和保护“大人”们的私有财产不被侵犯，才产生了城郭沟池。城市是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正象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所说，人类发展到“野蛮时期高级阶段全盛时期”（即父系制晚期），才产生了“由设雉堞和炮楼的城墙围绕起来的都市”（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2页）。这种城市往往是部落或部落联盟的中心，主要为政治、军事目的而设，所以有城而无市。当此之际，“城”是保守的，闭塞的。有人认为，有些城市起源于贸易交换的聚落，从而否认“城”有过这样一个闭塞时期。其实，有市而无城，也不能算真正的城市，城与市结合起来，那还是后来的事情。

由于统治者消费上的需要，城中出现了市。在我国，大约在殷商时期已出现这种情况，到周代，城中设市便成了普遍现象。

于是，出现了“左祖（宗庙）右社（社稷），前朝后市”的典型城市设计。城与市一旦结合，就必然打破封闭状态。城市成为联络广大农村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各城市间也日益发生频繁的联系。因此，从城市的本质而言，本来就不应看作孤立的个体。

都城又不同于一般城市，它是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为了担当联络全国的重任，各国都城的周围经常形成一个辅助城市群，现代城市学研究者称之为“首都圈”。其实，如果研究一下我们中国的历史，“首都圈”并不是现代才有的。历代王朝常在京师四周划一个很大的“京畿地区”，并设置许多城镇，担负军事防御、经济补给等不同任务，以保证首都职能得以正常行使。这实际上也是一个“首都圈”，只不过中国古代尚未出现这个名词罢了。

北京从周初，就已经是古蓟国的都城；后来，又成为古燕国的都城。战国时期，燕国强大起来，曾成为七雄之一。为了保证燕国首府蓟城的发展，大约在燕昭王时期，蓟城四周出现一个初步的辅助城市圈，南有燕中都、燕下都、燕易都，北有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五郡治所。它们既是燕国境内区域性的行政中心，又是蓟城的辅助城镇。从那时起，北京地区初步形成以蓟城为中心的城市体系。这个体系，已经把燕山南北、长城内外统为一体。

从秦汉到五代初，蓟城是我国北方的军事重镇。由于历代王朝总是把蓟城作为向北方草原和东北地区开发的基地，这个城市担负着特别繁重的军事任务。在这种情况下，蓟城周围的辅助城镇不仅没有削弱，反而进一步加强了。西北的沮阳，北部的渔阳，东部的蓟州，南部的范阳和雄、霸、易诸州，都是蓟城的辅助城镇。表面看来，这个辅助城市圈比古燕国时期似乎缩小了一些，但却更加紧凑、严密。

自辽开始，北京上升为陪都，金建中都，正式上升为都城；元建大都，成为全国的政治中心；此后，明、清两代都建都北京；一直到今天，北京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这时，北京周围

逐渐形成一个完整的“首都圈”，除了京城近郊县邑布局更加合理外，同时在距北京三四百里的圆周上形成一批较大的中心城镇。这就是保定、天津、唐山、秦皇岛、承德、张家口等（还有已经消失的草原城市元代上都开平）。它们与北京拉开一段距离，有一定独立性，但都和北京有紧密联系。这一圈城市还有一个重要特点：彼此有比较明显的分工。在本书各章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城市如何以自己独特的优势辅助着北京的顺利发展。北京又如何促进、带动着它们的成长、发育。历史说明，北京与周围城市是一个相辅相成，共存共长的整体。

由此可见，北京与周围城市关系史是北京史研究中重要的一环。

二

人类文化总是继承前人的成果，历史经验是我们的宝贵财富。历史上，在处理北京与周围城市的关系上 有许多 值得 借鉴的经验，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个问题的研究又是一个十分现实的、与当前首都建设直接关联的课题。

近年来，首都的规划和建设问题，日益成为人们十分关注的议题。解放30多年来，古老的北京迅速改变着它的面貌，出现了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但也带来许多令人担忧的新问题。工业迅速发展，人口急剧膨胀，污染严重，交通阻塞，用水紧张，居民衣食住行都发生困难。北京的气候又不断恶化，风沙日大，干旱剧增，虽然解放以来，在水利建设、城市绿化方面作了不少努力，但整个北京地区的自然环境仍未见大的好转。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人们提出了各种方案和设想。首先，学习国外经验，在北京郊区兴建“卫星城”。但实际上，城市中心地区人口仍然疏导有限，“卫星城”反而吸引来河北地区的许多新人口，造成北京城的继续膨胀。农田、绿地愈来愈少，农民只好在“大楼底下打游击”。幽静的山谷和文物风景区也为机器的轰鸣、工厂的烟雾所搅扰。

在这种情况下，有人又提出变北京为“节约型”城市的口号：节约用水，节约用电，节约地皮……总之，各方面都要勒紧腰带过日子。这在当前固然可以缓和一些矛盾，但从长远想，一个堂堂首都，搞的处处紧张，总不算完美上策。于是，有关领导部门不得不考虑把京、津、唐几个大城市统一长远规划，想在协调、分工中找到一个出路。但很快又发现，作为区域战略设想，仅把几个工业集中的大城市搞在一起考虑又不够了，而应把燕山南北、长城内外的整个“幽燕地区”统筹安排。这样，便又回到我们所说的历史上的北京首都圈问题上来。可见，事物本身总是遵循一定规律发展的。

这些年来，北京建设发展上出现的问题原因很多，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对历史经验尊重不够。

首先，从北京的历史特点来看，它从来不是一个经济十分发达的城市。我国历史上的古都，有的确实既是政治中心，又是经济中心。古代的长安和洛阳就是如此。但在中唐以后，我国经济中心转移到江淮一带，从此产生了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的分离。五代以后，北方民族相继崛起，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情况一再发生。为了既能控制中原，又适应北方民族大发展的形势，北京成为国家的都城。但这个城市却处在经济比较贫乏的北方。所以，长期以来北京主要是政治、军事、文化中心，它的经济需要，除靠河漕、海运外，还靠周围城市的补给和辅助。解放后，北京提出“变消费城市为生产城市”的口号。这在一定历史阶段，从改变北京封建社会寄生性的消费来说，是完全必要的。发展一些直接为首都居民日常生活服务的工业也是需要的。但是，作为一个首都，它的主要职能是什么？历史上形成的首都与一般城市的分工是否都不合理？同时，发展生产是否意味着都去搞重工业？尤其是近代以来，天津工业发展已经大大超过北京，北京有无必要再发展成一个大的工业城市？作为一个首都，它的主要职能从来就是政治、军事、文化中心。交通不很发达的古代，尚且可以通过河、

海运输，相互分工来解决首都需要，在现代化交通的情况下反而搞成无所不能、无所不包的大而全城市有无必要？其实，世界上的其他国家，首都也不都是工业中心。比如美国，工业中心在纽约，它不仅是全国巨大交通枢纽，也是工业、金融业中心，对外贸易总值占全国40%。而首都华盛顿主要是国家机关、科学文化机构所在地，只有印刷、食品和旅游等少量为首都服务的和适应首都特点的经济部门。由于这种较好的分工，直到1976年，华盛顿人口还只有70万，居民成分主要是政府官员和雇员，以及服务人员。但这并未影响其首都职能的正常发挥。再如巴基斯坦，当它在1947年刚刚独立的时候，曾经建都于最大的工商城市卡拉奇，这里的纺织、印刷、冶金、化工、机械等各种现代化工业都很发达。但不久，人们便发现，在这样一个终日嚣闹的经济城镇处理国家政务有许多不便。于是，1959年决定建新都，1961年正式动工兴建伊斯兰堡，后来把首都迁到这里。卡拉奇到1972年已有346万人口，而伊斯兰堡到1975年才有20万。由于人口较少，又无大的重工业，城市规划比较合理，东部为行政区，西部为居民和商业区，有少量的制造工业设在远郊。公园、山林、湖泊穿插其间。由此可见，北京历史上经济不够发达并不完全是弊病。完全否定一个城市的历史特点，不是明智的作法。工业搞的过多，不仅使人口剧增，生活困难，也影响首都的主要功能。历史上的北京，城市内外遍布湖泊、园林，而今却高楼林立，烟尘弥漫，完全改变了北京庄严、幽静、美丽的历史特征。这种作法究竟有无必要？

其次，历史上的北京与周围城市本来有一定的分工。天津是因北京漕运需要而发展起来的交通和商业城市，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它担负着为北京接纳漕粮的任务，并以它特有的渔盐之利和近代工业弥补北京的经济不足。保定是重要军镇、文化辅助城市 and 北京农副产品补给地。张家口除了充当军事要塞外，担负了对西北贸易的重任。承德则在清代成为北京不加名号的陪都，实际是一个政治分中心。至于唐山，完全是为适应京、津需要而发展

起来的重工业城市。这种分工是在长期历史发展中形成的规律性联系。从这种布局看，我们国家历史上的首都建设比其他国家有更丰富的经验。但在很长时期内，我们不仅没有很好总结这些经验，反而视为封建社会留下的“不合理现象”。尤其是近二三十年，条条块块划分过死，北京的“首都圈”被划分为几块，四周城镇一部分归北京管辖，一部分划归天津，大部分归入河北。政区的人为切割打乱了北京与周围城市的传统分工与联系。加上大家都想搞成大而全，闭关自守，自成体系，北京四周的辅助城镇又不愿充当“拾遗补缺”的“小角色”。结果，北京由于得不到这些城市的支援产生许多问题，这些城市由于失去北京这个最大市场而发展困难。同时，由于不注意保持各城市的传统优势，有的城市还相对萎缩（如保定）。而京、津、唐又相互争锋，各不相让，几个城市的水源、电力、原料、市场经常发生矛盾。唐山既有动力，又近原料产地，北京却搞大钢铁，天津是传统的化工基地，北京又搞大化工。结果，大家都吃苦头。

北京在建设历史上，曾有许多沉痛的教训，我们也总结得不够。人们都感觉到：北京气候恶化，水源日减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如果看看历史，便会发现，古代北京自然环境并非如此。在很长时期内，北京曾是一个河湖交织、山林密布、气候温润的地方。900多年前，北京作为辽朝陪都时期，燕山、军都山还是森林密布，郁郁葱葱，北部草原更是绿草如茵，并有高原湖泊镶嵌其中。但自金、元以后，由于历代王朝频修宫室、滥伐林木，民间也采樵作炊，才使太行山和燕山变成完全裸露的荒山土岭。从而造成自然生态的严重失调。近几十年，我们不但没有吸取这些历史教训，反而在“以粮为纲”的口号下“向草原要粮”，使张家口、承德等地区坝上草地大量沙化。蒙古高原寒风直下，卷起千里尘埃，自然要“风沙威逼北京城”了。因此，如果不对燕山、军都山及坝上草原进行综合治理，不对滦河、潮白河、永定河、拒马河上游统一疏导，彻底改变北京周围生态状况，北京的气候和用

水情况是难以根本解决的。

历史给我们留下成功的经验，也有沉痛的教训，不重视历史，不研究现状，就要受到惩罚。从这个意义上说，研究北京与周围地区和城市的历史，是当前建设事业的迫切需要。

三

北京与周围城市关系史，既然是一个新的科学领域，也就需要新的研究方法。为此，我在研究过程中，作了一点方法上的新尝试。

首先，尽量从总体上和联系中把握各个城市与北京的关系。

历史上留下来的旧方志，大都是对每个城镇、县邑作单体叙述。但实际上，每个城市都不可能离开周围环境影响。尤其是幽燕地区，由于有北京这个历史悠久、十分稳定，又极富吸引力和影响力的城市存在，周围城镇变化往往与这个主体城市有极大关系。现代科学强调系统论，就是说，不仅要看到事物的个性，还要从整体和联系中研究问题。从材料的积累来说，自然要从每一个城市、每一个地区、每一本方志和历史文献开始。但当我们得到这些素材之后，便不能象旧志书那样，简单叙述每个城市的历史沿革，城池变迁，土地人口，风景名胜，历史掌故，而要从北京地区城市体系的总体中，研究各个城市的联系，特别是与北京的相互关系。

实际上，北京地区城市体系是一种客观存在，它们是由长期的社会历史原因造成的。城市的形成与发展，当然离不开一定的自然地理环境。但是，作为人类文明发展的结果，则更多的与社会因素相联系。所以，我在研究这个问题时，更多地考虑了人们的政治、经济活动，而在自然因素方面，可能显得不够。

自从我接触北京历史问题以来，总感到有一个强大的纽带贯穿着这个城市的发展过程。除了历史悠久、文明素著这些人所共知的特点外，它还有一个最突出的特征，即北京是一个巨大的历

史接合部。从自然环境看，它把中原腹地和北方草原连接在一起；从经济上看，在长期的古代社会中，它是中原农业经济和北方草原畜牧经济的连接点；从民族关系上说，则是各族人民相互融合的大熔炉。中华民族本来就是一个既复杂又统一的整体，北京就象整个中华民族的历史缩影。它把燕山南北、长城内外连为一气，形成独具特色的“幽燕文化”。尤其是在北京上升为都城以后，更以极大的吸引力和影响力，带动着周围城市的发展。因此，我们在研究中就必须抓住北京历史这条主线，从北京的兴衰、发展和城市职能的演变中，寻求周围城市发展的原因。结果，我们从大量历史资料中得到证明，北京周围的许多城市确实是在北京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比如，在幽燕地区的早期历史上，东部海滨地区城市不够发达。是什么原因造成后来的大发展？一方面，固然与黄河造陆，海浸结束，生产条件逐步稳定有关，但更多的是因北京历史变化所引起。秦汉以后，幽州变为军事重镇，由于中原政权向东北不断开发，便要将中原粮草向幽州调运。于是，曹操开凿运河，沟通海河水系，隋炀帝则修通了整个大运河，从而造成天津地区的水上枢纽形势。当北京上升为都城之后，这个交通枢纽由于长期漕运而得到重视，天津这个城市便应运而生了。这就决定了天津主要是一个为首都服务的重大经济城镇。我们用同样的方法研究其他城市，很快找到了每个城镇与北京的内在联系。这样，就使我们摆脱了旧方志学那种孤立的、静止的、平面排比方法，把整个北京地区的各个城市看成一个有机的整体，找到了它们发育、成长的内在原因。在此基础上，我们再对各个城市的不同特点进行研究，从共性回到个性。

其次，注意进行多层次、多方面的立体交叉研究。

北京与周围城市的关系有一个发展过程，要了解它们的现在，首先要研究它们的过去。因此，我们在前三章中首先探讨了北京地区城市体系的历史发展总过程，然后，又在后六章中分别研究北京与每一个城市的具体关系。这样，便把纵向发展与横向

联系结合起来。

纵向历史研究，是为了认识城市关系上的时代特点。先秦时期，蓟城作为方国的都城，其影响范围还比较小。早期的燕国，是一个多民族的联合体，其境内的许多民族还处在部落联盟阶段。在这种情况下，幽燕地区的城市体系是不稳定，不规则，比较松散的。而当全国统一，蓟城成为军事重镇以后，这个城市体系才逐步严密起来。这个时期，蓟城周围城镇大多带有军事防御性质。北京地区真正形成一个完善的、合理的城市结构体系，还是建都以后。这个时期，不仅形成了一个稳固的“首都圈”，而且在各个城市间出现比较明显的分工，从不同角度辅助着首都的发展。这个历史过程，给我们一种启发，使我们认识到，随着时代的推移，应当如何建立适应当时具体情况的城市布局。

在横向研究中，我们侧重于北京建都后，特别是现存的周围辅助城市与北京的各项具体联系。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民族关系等各方面，分析每个城市的不同特点，以便更清晰地认识各城市的特殊优势，从而找到历史的借鉴。

历史的研究，归根到底是为了“以古鉴今”。不过，在很长时期内，这种合理的科学方法被歪曲了。特别是在十年动乱中，可以随意编造史实，不是搞影射史学，就是牵强比附。讲真话，会带来灭顶之灾。因此，当初我进入历史研究领域，本来并不打算解决什么实际问题，而是想在秦砖汉瓦和古城北京的久远回顾中找一点精神上的寄托。而今，历史却与现实发生了微妙的交叉。北京与周围城市关系史的研究，很自然地把我又带回到现实当中。如上所述，在处理北京与周围城市关系的问题时，凡是尊重历史，符合历史规律的作法，就获得成功；而不顾历史特点，不研究城市间的客观规律就会大吃其苦。从一个史学者的“良心”出发，不容许我避开这些问题。历史学本身，就是一门辩证、发展的科学。过去的发展自然要推向现在，硬把自己的脚步阻止在历史的门槛以内，本身就违反历史科学的规律。因此，本书虽以

北京地区城市间历史关系为重点，但最终还是落脚到现实问题上来。科学发展到现在，已经有愈来愈多的人认识到，把各种学科有机地结合起来，从纵向的历史分析，到横向综合研究现状，科学地预见未来，是我们认识社会，制定方针，确定自己发展方向的重要手段。如果本书能在这方面给人一些小小的帮助，也就是对我这几年一片苦心的慰藉了。

最后，在本书写作过程中，尽量打破门户之见，力求在历史学与考古学、地理学、城市学，以及其他学科的结合上作一点尝试。在材料的运用上，以方志为线索，用历代正史、笔记校正方志之误，尽可能运用新的考古资料和实地考察中获得的直接认识。不过，由于本人学识所限，面对的课题涉及面十分宽广，有些地区的历史资料极少，所以，总感到力不从心，难免粗糙之弊。但由于现实的迫切需要，又不容我旷日持久的琢磨。只好先以此书就教于方家，算是北京与周围城市关系史的研究上一个小小的开端吧。

两年多来，为完成这个研究课题，我对北京周围六个城市和地区，20多个县镇进行了实地考察，行程1.3万多里。所到之处，得到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1984年12月于北京

目 录

前言	1
第一章 蓟城中心地位的确立及周围城市	
体系的初步形成	1
第一节 北京地区早期的国家与城市——商代的	
燕与蓟	1
第二节 周初燕都变迁	6
第三节 蓟城中心地位的确立及燕国蓟城	
位置考辨	10
第四节 燕下都的兴起	16
第五节 燕国北方五郡的建立与北京地区城	
市体系的形成	21
第二章 北方军事重镇时期的蓟城及周围城市	
体系的稳定与发展	27
第一节 蓟城职能的变化	27
第二节 蓟城周围城市体系的发展与结构	32
第三节 蓟城的西北屏障——沮阳	36
第四节 蓟城北部重镇——古渔阳	42
第五节 燕南门户古范阳（涿州）	46
第六节 蓟州的兴起	51
第三章 北京上升为都城及其首都圈的形成	57
第一节 北京建都的历史条件	58
第二节 北京建都后出现的问题及对周围	
城市的新要求	65

第三节	北京首都圈的结构及作用·····	76
第四章	北京的东部门户——天津·····	83
第一节	古代北京的军事活动与运河修通 及海河水系的形成·····	84
第二节	北京转化为都城及漕运的发展与 天津聚落的形成·····	92
第三节	古代天津的渔盐之利弥补了北京 物资财富的不足·····	101
第四节	天津工业的勃兴与北京·····	106
第五节	从拱卫京师的锁钥变成了帝国主 义入侵北京的孔道·····	112
第六节	历史的结论以及对我们的启示·····	117
第五章	古城保定与北京·····	121
第一节	保定是北京的战略门户·····	122
第二节	保定是北京的文化辅助城市·····	131
第三节	保定地区是北京农副物资和手工 业产品补给地·····	137
第四节	北京旅游圈与保定地区历史文物 资源·····	145
第五节	保定衰落的原因及今后与北京关 系展望·····	151
第六章	张家口地区与北京·····	156
第一节	哪些因素决定了张家口与北京的 依存关系·····	156
第二节	北京的军事屏障·····	162
第三节	通往蒙古高原的交通要道·····	169
第四节	贸易互市与张家口的兴起·····	176
第五节	张家口地区自然环境变迁及其对 北京的影响·····	181

第六节	张家口与北京未来关系的展望与建议·····	185
第七章	承德与其所属地区与北京在历史上的关系·····	187
第一节	古代承德地区是幽燕汉族人民与北方民族的接合部·····	188
第二节	承德地区是幽燕北上的交通古道·····	194
第三节	承德——不加名号的陪都·····	200
第四节	承德兴起后所出现的新问题·····	206
第五节	承德地区历史上的自然资源、经济形态及其与北京的关系·····	212
第八章	京师锁钥与旅游胜地——秦皇岛·····	221
第一节	从险要的地理形势和古代民族关系看山海关对北京的重要意义·····	222
第二节	北京历史地位的变迁与山海关的军事战略作用·····	228
第三节	现代港口的开辟使秦皇岛成为北京的海上门户·····	235
第四节	北京的休养与旅游胜地——北戴河·····	240
第九章	京津的工业辅助城市——唐山·····	247
第一节	唐山的地理形势与早期历史·····	248
第二节	北京的政治经济需要和天津工业的兴起与唐山早期发展·····	251
第三节	唐山工业的全面发展及其对京津的重大影响·····	259

第一章 蓟城中心地位的确立及周 围城市体系的初步形成

在很长历史时期内，北京是我国北方重要的中心城市。北京这种中心地位并不是一开始就确定的，而有一个长期发展和选择的过程。当它的中心地位确立之后，又逐渐在其周围形成一系列辅助城市。我们把这个以北京为中心的城市体系称为“北京城市圈”。这里所要探索的就是这个城市圈的形成和早期发展情况。

北京形成幽燕地区的中心城市大体从春秋中叶开始，也就是在周代燕国以蓟城为国都之后。而蓟城的出现却远早于此。因此，这里不得不追溯其更早的史实，然后再着重探讨蓟城的中心地位及其周围城市的关系。

第一节 北京地区早期的国家与城市 ——商代的燕与蓟

城市的出现是随着奴隶制的产生和国家的建立而来的。我国商代和西周，是青铜器的鼎盛时期，也是奴隶制最发达的时期，北京地区城市发展的历史也正是从这时开始的。

北京地区商代城市分布情况如何，到目前为止情况尚不很清晰。但从平谷刘家河商代遗址、昌平雪山文化第三期情况，及琉璃河商周城址的发现来看，无疑在商代已有相当发达的奴隶制度出现。

雪山文化，是指在北京昌平区雪山村所发现的一处重要文化遗址所反映的古代文化情况。这个文化遗址可分三个层次，代表

三个不相衔接的文化时期。其下层为第一期，与中原仰韶文化十分接近。这个时期的雪山人已经可以生产比较粗糙的夹砂红陶。雪山文化的第二个时期，与龙山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个时期的雪山人，已经掌握了更高的制陶技术，可以生产光亮的黑陶。这两个时期，都属于新石器时期。而在雪山第三期文化中，不仅有更为精制的鬲器，而且发现金质和青铜质料的装饰品，它标志着青铜器时代的开始，说明北京地区的历史已跨入阶级社会的大门。

1977年，考古工作者在平谷县刘家河发现了一座商代中期墓葬。其中有一件青铜耳环，还有一件形态相仿的耳环是用黄金制作的，其形状与雪山三期文化的铜耳环极为相似，说明系同一源流，由此又证明雪山三期文化可能已进入商代。此外，还有金臂钏、金发笄和十几件青铜礼器，有工艺复杂的三羊铜罍、鸟柱龟鱼纹铜盘、饕餮纹圆腹鼎等。可以想见，那些金光摇曳的饰件如何佩带在贵族妇女的头上，而华美的大型酒器也只有贵族奴隶主的宴会上才可能使用。刘家河还出土有一件铁刃铜钺，我国还有一件现存的铁刃铜钺出自河北藁城，二者形制基本一样。它表明，当时北京地区奴隶制度的发展和生产水平已经与中原不相上下，个别生产部门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奴隶制的发展必然带来国家的建立和城市的出现。幽燕地区在商代晚期可能出现过不少由不同部族所建立的小方国，随之，也出现了一批小城镇。见于史书记载的主要有燕国、蓟国、孤竹、令支、无终和土方等。

土方是一个很大的部族，其活动中心区域在今河北怀安附近，即河北与山西交接之地。也有人认为，燕山南部的许多小方国最初都包括在土方部族之中。

无终氏是一个古老的土著民族。《水经·鲍邱水注》载：兰水“出北山，东流屈而南，经无终县故城东”，“其水又南入灤水，灤水又西南入于庚水”。庚水即今蓟县境内舟河，灤水即滦河。由此可知无终故城在今蓟县，是无终国的政治中心。在蓟县围坊和张